

# 种族主义顽疾缠身 生存“黑白分明”

## 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之二

事件后针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群体的攻击……桩桩件件都充满苦难与伤痛。

### 资源分配不公

美国当下虽然在法律上确定了黑人的“平等”权利,但实际上在教育、就业等重要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平等依旧显著。

有数据显示,美国每年高中毕业生中非洲裔约占15%,而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常春藤名校新生中非洲裔占比仅为8%。仅三分之一的非洲裔在进入大学后能顺利毕业,比例是白人的一半。和白人同学相比,非洲裔学生背负更多学费贷款,经济状况也更差,这成为他们辍学的主因。

有色人种也是职场中隐形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洛杉矶时报》网站去年7月登载的一篇报道说,脸书公司被控在雇用、补偿和晋升方面存在对非洲裔的系统性歧视。数据显示,2019年在美担任该公司技术职务的员工中只有1.5%是非洲裔,高级领导层中只有3.1%是非洲裔。过去5年,该公司的雇员增长了400%,但上述比例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 “两套司法系统”

近年来,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死亡案件频发。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市非洲裔青年布朗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警察

枪杀;2018年,非洲裔男子布拉德福德在亚拉巴马州见义勇为却被警方视作凶手打死;2020年5月,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当街残忍“跪杀”,在全美多地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

弗洛伊德那句“我无法呼吸”的呻吟,道出遭受不公待遇的美国非洲裔的心声。有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警察共枪杀1127人。非洲裔虽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3%,却占被警察枪杀人数的28%,概率是白人的3倍。

绝大多数涉嫌暴力执法的警察是白人。有统计指出,2013年至2020年,约98%的涉案警察未被指控犯罪,被定罪的警察更是少之又少。社交媒体上不少人抨击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特权”现象,称美国“有两套司法系统”。

### 生存“黑白分明”

《华盛顿邮报》近期援引3名经济学家发布的报告指出,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美国非洲裔与白人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且丝毫没有缩小迹象。报告说,2016年,11.5个非洲裔家庭的资产总值加起来才勉强与一个普通白人家持平,而一个拥有高中学历的白人所获得的家庭财富几乎是普通非洲裔家庭的10倍。

新冠疫情进一步凸显美国种族不平等恶果。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

示,美国新冠患者中,非洲裔、拉美裔和原住民的死亡率是白人的将近3倍。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自疫情暴发后,美国非洲裔成年人失业率远高于白人。

《今日美国报》评论说,有色人种死于疫情的人数远远多于白人,可归因于不等的教育与经济体系导致有色人种工种受限,住房歧视导致有色人种居住密集,以及以牺牲穷人为代价的环境政策等。

### 仇视暴力升级

严重的种族歧视导致美国仇恨犯罪数量居高不下。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显示,在2019年执法部门报告的8302起单一偏见引起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6%涉及种族族裔身份,其中高达48.4%针对非洲裔,15.8%针对白人,14.1%针对拉美裔,4.3%针对亚裔。

去年以来,由于少数美国政客借疫情污名化亚裔,致使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不断升级。美国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美国16个主要城市中,2020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比2019年上升149%。就在今年3月16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发生3起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其中就包括6名亚裔女性,引发全美各地对疫情中不断加剧的针对亚裔暴力和歧视的强烈抗议。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 殖民罪行难逃历史控诉

## 揭批美国五大“原罪”系列评论之一

原住民。

多届美国政府曾发布政策鼓励对印第安人的屠杀。1814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奖励50美元至100美元。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林肯颁布的《宅地法》把屠杀印第安人的活动推向高潮。该法规定,每个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只需缴纳10美元登记费,就能在西部获得不超过160英亩(约合64.75公顷)的土地。在土地和赏金的诱惑下,白人纷纷跑到印第安人所在区域展开大肆屠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谢尔曼甚至留下一句“名言”：“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在美国政府武力威胁下,19世纪30年代,居住在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被强迫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饥寒交迫或疾病死在路上。这条上演无数惨剧的迁徙之路,被后人称为“血泪之路”。“这



长期以来,美国以“山巅之城”自诩,把自己吹嘘成肩负着传播民主自由的所谓“天赋使命”国家。然而,翻开美国历史,满眼是暴力、谎言和狡诈。从亡种灭族的殖民罪行,到让人“无法呼吸”的种族歧视,从贻害无穷的武力干涉,到荼毒世界的动乱输出、害人害己的双标做派……诸多“原罪”,植根于美国立国发家的基因中。

为掠夺土地和资源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是美国罄竹难书的殖民罪行之一。“住在联邦地区的美国人,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那些仍然被印第安人占据的土地。”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精辟刻画了当时的美国觊觎印第安人资源的丑陋嘴脸。美国在建国后的上百年中,系统性、大规模地驱逐和屠杀这些世代代居住于北美大陆的

# 日方应对国际公共利益负责

## 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拟决定核废水排海事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就日本拟决定核废水排海事答记者问时表示,为维护国际公共利益和中国人民健康安全,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明严重关切,要求日方切实以负责任的态度,审慎对待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政府将于4月13日举行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含有对海洋环境等有害的核废水。上周五外交部发言人已就此作出表态。韩国外交部官员也要求日本政府确保信息公开透明,按照环保基准客观评估,同所有利益相关国保持紧密沟通。请问中方对此有无进一步评论?

赵立坚说,日本福岛核事故是迄今为止全球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核事故之一,事故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已经产生深远影响。妥善处置福岛核电站废水问题关系到国际公共利益和周边国家切身利益,理应慎重妥善把握,确保在各有方共同参与下,有效避免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带来进一步损害。

赵立坚说,目前国际舆论对日方拟决定核废水排海高度关注,普遍表示质疑和反对。日本国内也有不少强烈反对意见。我注意到日方经常要求他国履行国际责任,现在国际社会都在看着日方,日方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事关系重大,日方应对国际公共利益负责,这也是对本国民众利益负责。

赵立坚说,为维护国际公共利益和中国人民健康安全,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明严重关切,要求日方切实以负责任的态度,审慎对待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

# “对于损害香港的虚假信息,我决不会坐视不管”

## 英籍资深大律师江乐士批驳西方不实言论

新华社香港4月12日电(记者方栋)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外国人中,很少有人能比英籍资深大律师江乐士更了解这里。

早在1978年,江乐士就开始在香港从事刑事检控工作。1997年,他成为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首任刑事检控专员,见证了香港始终保持司法独立并在民主发展等领域不断取得进步,也亲历了反中乱港分子对香港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实践的破坏。

面对西方近年来对香港事务的无理指责和干预,他用自己的经历向世界讲述真实的香港,回击不实言论和造谣诽谤。“对于损害香港的虚假信息,我决不会坐视不管。”江乐士说。

### 西方“就是为了指责而指责”

在江乐士的记忆中,西方世界多年来在香港事务上的指指点点几乎没有能站得住脚的,包括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横加指责也不例外。

“那些指控盲目无脑,根本不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就是为了指责而指责。”江乐士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系统修改和完善。随后,香港特区本地法律修订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

“完善选举制度显然是非常必要的。”江乐士认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社会从“修例风波”的动荡中逐渐恢复,然而反中乱港分子随后企图利用选举制度漏洞控制特区立法会,进而颠覆特区宪制秩序、夺取香港管治权。

“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不会容忍这种行径,阴谋策划、实施此类活动的人也绝不会出现

在管治体系中。”江乐士说,“爱国者治港”原则也并非香港特有。“担任政治职务的人士必须把国家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否则在民主政治中将毫无前途。世界各国均是如此,为什么香港要有不同?”

为何西方对香港进行无休止的指责和干预?

江乐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反华势力妄图通过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来损害“一国两制”的实践,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试图以各种方式来伤害香港。”

“外部势力企图通过干预香港事务来打击中国。我认为,像我这样了解香港真实情况的人就更应该站出来发出声音,而不是躲在桌子底下。要让世界知道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江乐士说。

### “香港民主发展进步巨大”

江乐士亲身经历了从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到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见证了香港在回归后不断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他尤其对香港民主发展感触颇深。

“1997年起,香港民主发展进步巨大。”江乐士说。

江乐士表示,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时,香港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当时的立法局根本就没有选举,要么是官守议员,要么就是港督委任的。“回归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改变,香港开始根据香港基本法逐步推进民主进程。”他说。



英籍资深大律师江乐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4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然而,香港民主稳健发展的步伐却被打着“民主”幌子的反中乱港势力所阻挠。江乐士指出,遗憾的是,所谓的“民主派”在2015年否决了特区政府提出的行政长官普选法案,令2017年第五任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不能由普选的办法产生。

江乐士认为,那些被外媒吹捧为“民主斗士”、在街头打砸抢烧的暴徒,那些勾结外国势力、支持甚至参与暴力活动的立法会议员,才是香港民主进程的破坏者,“这些人完全不适合成为民主社会的代表,他们本身就是对

民主的威胁”。

对于有媒体质疑完善选举制度将打压不同政见,江乐士也并不认同。

“政治多元化依然得到认可,拥有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只要他们遵守宪法和基本法,尊重社会主义制度,为香港的最大利益而努力,不从事危害‘一国两制’的活动,他们的立场和意见就会得到尊重。”他说。

“现在的这些新措施,就是为了确保香港的民主进程能够继续下去,为香港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江乐士说。

### 司法独立依然“强大并充满活力”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已在香港从事刑事检控工作近20年的江乐士被任命为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首任刑事检控专员。

“对于这一任命,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很多人认为,在香港回归后外籍人士在政府高层职位上的角色会很有限。”江乐士说,“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如果你对香港的发展有担当,你关心香港的福祉。那么你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

事实上,在香港的司法机构和警队中,有许多外籍人士担任高层职位。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就拥有14位海外非常任法官,香港警队的高级警官中也有英籍指挥官。

江乐士在刑事检控专员这一位置上干就超过了12年,对于香港司法独立的运作情况最有发言权。

“回归后,香港的司法独立一直保持不变。在担任刑事检控专员期间,我的工作没有受到过任何干扰。我们依然采用和其他普通法地区在检控时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包括无罪推定原则等。”他说,“香港独立的司法体系一如既往的强大并充满活力,也一如既往的安全可靠。”

实际上,香港司法机构在回归后享有的独立地位要胜过回归以前。

江乐士表示,司法独立在以前只是惯例,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正是由于香港回归,香港基本法才以明确的法律条款形式确定了下来。“从法官到检控人员,司法人员的权利受到基本法的保护,这让人非常安心,也是香港法治的一大优势。”

此外,基本法明确了香港享有终审权,香港特区终审法院于1997年7月1日成立,取代了伦敦枢密院的司法委员会,成为香港最高的上诉法院。

“回归前,香港人需要跑到英国伦敦去上诉。现在,我们在自己的地方就能处理了。这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安排,而且事实证明非常成功。”江乐士说。

40多年前,江乐士在伦敦只是一名初级检察官,一个短期工作机会让他和香港结缘。这份工作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职业空间,也让他感受到了香港昂扬的奋斗精神,促使他最终决定留在香港发展。

回看当年,江乐士依然十分赞同最初的决定。“我认为,整个国家都希望香港取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司法机构受到尊重。”他说。

(参与采写:林宁、张一弛、吴晓初)